聖安德魯修道院雜記：陸徵祥的史料、回憶錄與傳記

MENU

Diner

du 28 Juin / 10 Juillet 1897, St. Pétersbourg.

Hors-d'œuvres

Potages: Tortue / St. Germain

Petits pâtés

Sterlet Dwinskoë à la Russe

Noisettes de Veau, Périgord

Chaufroix d'Orlolans, Cumberland

Punsch Victoria

Rôtis: Jeunes Poulardes et Bécasses

Salade Romaine

Asperges, sauce Hollandaise / Polonaise

Plombière Nesselrode

Tartelettes aux Framboises

Fruits.

馮先祥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古今論衡　第 31 期　2018.10

有關陸徵祥的生平，我們並不陌生。他在晚清擔任駐俄使館翻譯，爾後升任駐荷蘭欽使。辛亥革命後，接受袁世凱的邀請，毅然返國擔任外交總長。主持外交部期間，他推動外交改革，也在一九一五年萬般無奈地簽字接受《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一九年，他代表中國，率團參加巴黎和會，最後因不願在山東問題上讓步，拒簽署對德和約。和會之後，他請辭總長一職，逐漸淡出北京政壇。一九二六年，結縭二十多年的夫人培德（Berthe Bovy）因病過世。悲痛之餘，隔年他下定決心，以後半生服事天主，進入位於比利時布魯日郊區，隸屬本篤會之聖安德魯修道院（Sint-Andriesabdij, Zevenkerken）修道。至此之後，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納粹強行徵用修道院而被迫搬離外，他一直寓居於此。一九四九年初，陸徵祥在布魯日市區的醫院病逝，其遺留的上千件私人物品和檔案則由修道院保管至今。

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聖安德魯修道院有場簡單而別具意義之儀式。院長雷內・佛勃院長（René Fobe）代表該院，接受中央研究院移交的 49 冊數位化陸徵祥史料的精裝印刷本。❶對於歷史學界來說，這不啻是一項重大進展。原始史料能得到更加完整的保護，而數位化也使其能得到更爲廣泛的應用與研究。目前該資料庫似乎尚未正式上線，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開放給公衆利用。就筆者所知，這項數位化合作案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講述的故事。二〇一四年七月中旬，在歐洲考察的臺灣立法委員參訪團，抽空拜訪修道院。參訪團成員之一的呂學樟立委看到陸徵祥遺留的檔案和私人物品之保存狀況不甚理想，提議臺灣的外交部居間協調支援，而中研院提供修道院必要之專業協助，加強保護這批珍貴的史料。❷約兩個月後，得到時任副院長的王汎森院士的支持，中研院委派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鍾淑敏，帶領一組數位文化中心的團隊前往修道院調查陸徵祥史料之保存狀況。經過漫長的協商，雙方於二〇一五年聖誕節前夕簽署合作協議。❸再經過一年多，數位建檔和整理的工作告成，中研院將成果轉交修道院。

從提出構想、簽署協議到完成計劃，這項合作案歷時近三年。看似政治味濃厚的合作案，事實上，應歸功於魏崇明先生和阮麗明女士這對熱誠的華僑夫婦在幕後奔走。魏先生是退休的比利時外交官，曾派駐土耳其、韓國等多個國家。他的祖父魏宸組是民國時期中國駐比利時公使，也是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他曾在筆者

＊筆者曾於二〇一四年隨中研院團隊前往聖安德魯修道院，進行陸徵祥史料初步調查整理之工作。同時，筆者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之修改意見，也感謝魏崇明先生和阮麗明女士提醒本文初稿不足之處，最後感謝劉明達同學的認眞校對。僅此致謝。若不幸仍有疏漏之處，筆者當負有完全之責任。

❶〈塵封百年外交秘辛 陸徵祥文物將公開〔影〕〉（2017.03.10），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03100059-1.aspx（2017.08.18 檢索）

❷〈立委訪陸徵祥紀念室 憶一戰〉（2014.07.15），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715002381-260408（2017.08.18 檢索）

❸ "Academia Sinica, Belgian abbey sign document deal" (2015.12.20), *Taipei 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5/12/20/2003635234（2017.08.18 檢索）

面前表示，歐洲有許多家族皆有從事外交工作的傳統，中國卻鮮少有類似的外交官世家，而他家也有類似歐洲那種從事外交工作的家族傳統。他們夫婦曾前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等處查閱魏宸組的史料，其中有許多他和陸徵祥之間的通信。相較於魏宸組的史料受到專業學術機構的妥善保護，陸徵祥孤老而終，不但沒有後人幫忙整理遺物，而且修道院在史料保護這方面也力有未逮。他們夫婦頗爲不忍。既然陸徵祥是他們祖父的老長官，他們相信，盡心替陸徵祥做這些事是應該的。在歷史責任感的驅使之下，自二〇一一年起，他們夫婦抽空往返於布魯塞爾和布魯日之間，與西弗蘭德大學孔子學院的馮浩烈院長（Philip Vanhaelemeersch）合作，著手整理陸徵祥遺留的檔案與私人物品。他們同時也透過各種渠道，探詢資源豐富的學術研究機構共同參與的可能性。在機緣巧合的配合之下，中研院決定挹注資源，介入保護這批珍貴史料。如果沒有魏崇明和阮麗明兩人的熱心奔走，這項合作案不會促成。他們可說是幕後最關鍵的人物。

當這項合作案完成之際，陸徵祥的法文回憶錄《回憶與隨想》（*Souvenirs et Pensées*）的中文譯本也於二〇一六年下半年問世。❹長久以來，羅光的《陸徵祥傳》和石建國的《外交總長陸徵祥》一直是我們認識陸徵祥的主要傳記類著作。❺現在，回憶錄與史料變得更容易接觸，我們得到一個重新認識、重新評價陸徵祥之契機。他是外交官、是天主教神父、也是海外華僑。他的回憶錄與史料，多大程度上，能增進我們對他在北洋官場或歐洲修道之理解？對於近代史研究，又有什麼可能的貢獻？筆者相信，陸徵祥的回憶錄有其價值，而其史料更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民國時期的外交官群像、中梵關係史、歐洲華僑史等相關課題。

一、簡潔的回憶錄以及各有側重的傳記

（一）從《回憶與隨想》到羅光的《陸徵祥傳》

《回憶與隨想》是一本相當簡潔的回憶錄。陸徵祥謙虛地認爲這本書「僅僅是本人對往昔的一些記憶片斷和思索拾遺，算不得回憶錄」。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佔領比利時，佔用聖安德魯修道院，驅離院內所有修士。陸徵祥被迫搬離暫住他處。

❹ 陸徵祥，王眉譯，《回憶與隨想：從民國外交總長到比利時修道院修士》（*Souvenirs et Pensées*）（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

❺ 羅光，《陸徵祥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石建國，《外交總長陸徵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這本傳記是石建國早年之《陸徵祥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的增訂修改版。胡心鼎等人也在近年共同撰寫一本傳記。由於該書較爲通俗，對史實之掌握，稍嫌不夠嚴謹，故筆者在正文中略去。胡心鼎等，《弱國外長陸徵祥：獻給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❻ 陸徵祥，《回憶與隨想》，「前言」，頁 1。

> 比國人輾轉於強敵鐵蹄之下，憂愁沉鬱。興老（陸徵祥字子興，有時作子欣）認爲該去振作他們的精神，……怎樣可以使比國人一心信托天父呢？興老便決意把自己一生的經歷，給他們講說。……於今他感到天主命他把往事拿出給人看，不爲炫耀自己的功德，……但爲給人家證明天主怎樣慈心照顧一個人的一生。如是比國人也可相信自己的國家是在天主的手中，必有重見公義天光的一日，……❼

這段期間，陸徵祥應衆人邀請，在布魯日做了四次關於他生平經歷的見證。戰爭結束後，其講稿經整理於一九四六年以法文出版。他的秘書愛鐸（Edouard Neut）又將書稿「擬寄英國，託友人譯英，在英京出版」。❽這本回憶錄亦有德文、荷蘭文、以及義大利文的翻譯，「僅法文版就達 2.8 萬冊」。❾在法文版問世七十年之後，中文譯本才在二〇一六年出版。

這本回憶錄與羅光的《陸徵祥傳》有千絲萬縷之關係。羅光在一九三九年以及一九四八年，兩度前往聖安德魯修道院訪問陸徵祥，他寫的傳記最早於一九四九年出版，後來改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❿不但兩書的醞釀過程重疊，而且羅光在傳記中也多次引用《回憶與隨想》，我們很難說兩者之間沒有互相影響的成分。事實上，兩書多有敘述一致之處。例如，有關袁世凱帝制運動之段落，兩書皆提到陸徵祥曾建議袁世凱維持共和體制，以終身總統職取代帝制，但最終不爲採納的這一小段軼事。⓫

另一方面，羅光是天主教會的主教。他主要關心陸徵祥的精神生活與宗教奉獻。在他的傳記中，有極大的篇幅是描寫陸徵祥的宗教信仰與修道歷程，陸徵祥被看作是位信仰虔誠且堅定的愛國天主教徒。對於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羅光比較不擅處理複雜的歷史問題，傾向用大量的軼事呈現其觀點。換而言之，這本傳記的脈絡化敘事稍嫌不足。當講述《二十一條要求》的談判過程時，羅光稱孫寶琦（時任外交總長）和曹汝霖皆主張無條件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⓬針對這一點，曹汝霖後來在回憶錄裡特別加以反駁。「《陸徵祥傳》一書，所記與事實不符，且說我與慕韓（孫寶琦字）主張即行承認，不必商議，更屬無稽。」⓭事實上，爲了與日本進行談判，袁世凱重新任命陸徵祥，取代孫寶琦爲外交總長，而曹汝霖獲得留任。陸和曹兩人被指派一同與

❼ 羅光，《陸徵祥傳》，頁 225。

❽ 1945 年 3 月 2 日陸徵祥日記。英文版：Dom Pierre-Célestin Lou Tseng-Tsiang, Michael Derrick trans., *Ways of Confucius and of Christ* (London: Burns Oates, 1948).

❾ 石建國，《外交總長陸徵祥》，頁 261。

❿ 羅光，《陸徵祥傳》，頁 1-3。《陸徵祥傳》的第一版最早由香港眞理學會於一九四九年出版。有關羅光拜訪陸徵祥之軼事，羅光，〈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上）〉，《傳記文學》19.2（1971）：46-51；〈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二）〉，《傳記文學》19.4（1971）：80-84；〈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三）〉，《傳記文學》19.5（1971）：79-84；〈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續完）〉，《傳記文學》19.6（1971）：61-64。

⓫ 陸徵祥，《回憶與隨想》，頁 47。羅光，《陸徵祥傳》，頁 92。

⓬ 羅光，《陸徵祥傳》，頁 97-98。

⓭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香港：春秋雜誌社，1966），頁 116。

日本代表談判。按理來說，如果曹汝霖力主無條件接受，袁世凱似乎不太可能有理由讓他參與談判。曹汝霖一般給人的形象是比較比較親日的，但在《二十一條要求》的談判過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遠比羅光過度簡略的去脈絡化描述要複雜得多。羅光是陸徵祥的教友，對陸徵祥的宗教信仰有相當詳盡的第一手觀察。然而，由軼事堆砌而成的歷史敘事，似乎很難深刻剖析當時複雜的政治與外交問題。

（二）石建國的《外交總長陸徵祥》

另一方面，石建國的《外交總長陸徵祥》，跳脫過往中國大陸歷史學界之「喪權辱國」的空泛敘事框架，反思陸徵祥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大量利用檔案和報刊，石建國將陸徵祥經歷的政治和外交事件放回原本複雜的歷史脈絡之中，從比較宏觀的角度，重新理解陸徵祥。這本傳記是晚近北洋外交史研究最重要的代表著作之一。它對陸徵祥的政治與外交生涯之著墨，恰好彌補羅光的不足。

對於陸徵祥的評價，石建國似乎非常依賴民國初年親進步黨的申報北京特派記者黃遠庸之觀察。黃遠庸認爲：

> 陸君恂恂下人，出言有章，蓋一絕好歐西紳士之風度。然其體質既羸，一見若弱不勝衣者，又其談吐超俗，似於吾國之社會人事不甚融解者。……此君涉足於中國今日政界，猶以一葉汎於波舉風發之大海，未有不顛覆者。⓮

陸徵祥的個性溫文儒雅，不善與人相爭。他可以是位平易近人的朋友。然而，處在派系錯綜複雜的北洋政府，這樣的個性有時會變成在政壇生存的軟肋。他長期旅歐，與國內各派甚少聯繫。袁世凱因爲這一點於一九一二年六月任命他爲內閣總理，取代唐紹儀。隨著袁世凱和國民黨之間的政爭愈演愈烈，陸徵祥在這個位置上又「以他自己『服從合法政府，輔佐政府元首』的從政原則行事的」，「一切政令均聽命於袁世凱」。⓯在參、衆兩院，他被看作是袁世凱的傀儡。親國民黨的議員借題發揮，猛烈攻擊，最後陸徵祥只得黯然下臺。再者，巴黎和會期間，中國代表團內部因全權代表之間的排名順序引發爭執，加上代表國民黨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強勢挑戰陸徵祥的領導地位，代表團內部變得紛亂不堪。顏惠慶頗有微詞，「但認爲陸徵祥的軟弱是造成這一切的根源。」⓰陸徵祥在巴黎和會的所作所爲「確實有點不盡人意」，但在山東問題上，他堅持立場，拒簽對德和約。對於這一點，石建國高度肯定。⓱大體而言，《外交

⓮ 黃遠庸，〈外交總長宅中之茶會〉（1912.12.09），收入黃遠庸著，《遠生遺著》（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8），卷三，頁 14-15。
⓯ 石建國，《外交總長陸徵祥》，頁 111。
⓰ 石建國，《外交總長陸徵祥》，頁 207。
⓱ 石建國，《外交總長陸徵祥》，頁 222-223。

總長陸徵祥》對陸徵祥的欽佩多過批評。由於個性使然，北洋政壇的前半生「毀譽參半」，歸隱修道的後半生則「功德圓滿」。[18]

總的來說，《回憶與隨想》可看作是一本簡短的陸徵祥口述史，而《陸徵祥傳》則是這本口述史帶有羅光個人註解的擴增與延伸。若我們希望理解陸徵祥的精神生活與宗教信仰，這兩本書是必要的媒介。順帶一提，《回憶與隨想》有一處極易引起誤會的地方。有關《二十一條要求》的段落有一句話，「談判進展到日本外相出面之時，加藤高明（Hioki）正式表示他希望會談從早上開始持續到夜晚。」[19] Hioki 應該是指當時的日本駐中國公使日置益（Hioki Eki），並非日本外相加藤高明（Katō Takaaki）。法文和英文的原文是，le ministre du Japon à Pékin 以及 the Japanese Minister in Pekin；中文意思應該是在北京的日本公使，並非日本外相。[20] 這句話正確的意思是，日置益與陸徵祥就如何談判《二十一條要求》進行磋商，而日置益要求夜以繼日開會，儘速完成談判。中文誤翻日本外相加藤高明，造成極大的誤會，讀者必須留意。至於陸徵祥的政治和外交生涯之評述，我們依然得依靠石建國的傳記。這三本書沒能涵蓋的部份，就是陸徵祥史料能帶給我們的新面向。

二、豐富卻鮮少被利用的史料

佛勃院長曾對筆者表示，包括顧維鈞的後人在內，前來修道院參觀的訪客絡繹不絕。陸徵祥留下哪些史料？對我們理解歷史能提供什麼幫助？這批史料數量龐大，但利用它們做研究的歷史學家卻不多見。大體而言，這批史料可分爲兩部份。第一，特別設立的展覽室，專門存放他的私人物品，包括生前使用的書桌、書架、藏書、印章、勳章、照片、友人贈送的書法字畫等等。第二，總計 52 箱的檔案，主要有信件、日記、筆記等等，存放在修道院的檔案室。這批史料上溯十九世紀末，下至二十世紀中葉，涵蓋晚清、民國、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時間跨度大，類別豐富。簡單來說，這批史料很大程度反映他做爲外交官、天主教神父、海外華僑的三重身份。

（一）文物

陸徵祥遺留的物品種類繁多，而展覽室缺乏完整的陳設規劃，容易給人某種雜亂無序之感。令人遺憾的是，其中似乎有遺失的物品，亦有被銷毀物品。據說，陸徵祥喜愛收藏鋼筆，死後留下十幾支。目前展覽室內僅剩一支，其餘的鋼筆下落不明。夫

[18] 石建國，《外交總長陸徵祥》，頁 268。

[19] 陸徵祥，《回憶與隨想》，頁 46。

[20] Lou Tseng-Tsiang, *Souvenirs et pensées: Les chemins de Confucius à la rencontre du Christ* (France: Traditions Monastiques, 2015), p. 65. Lou Tseng-Tsiang, *Ways of Confucius and of Christ*, p. 36.

人培德過世後，陸徵祥將她的毛髮、牙齒、血液收集保存在一只容器內，並將其送給培德的母校紀念。陸徵祥過世後，該校將容器返還修道院。有修士覺得此乃不祥之物，後來決定銷毀處理。因此，我們目前僅能看到該容器的圖片介紹（圖一）。必須注意的是，展覽室其中三件物品已被佛蘭德政府指定爲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地方文化遺產，受嚴格的法律保護，未經有關單位批准，不能離開當地。第一件是巴黎和會期間有關國際聯盟的中文報告；第二件是巴黎和會期間拍攝的相冊；第三件是 Enrico Arcioni 畫的陸徵祥油畫像。這幅畫曾於二〇一一年在臺北駐比利時代表處主辦的陸徵祥紀念特展中展出。

圖一（圖片皆由作者提供）

除上述三件物品外，陸徵祥留下的書籍、書法、照片也值得我們關注。他生前有不少中外文藏書。他時常透過倫敦和巴黎的書商訂購書籍。例如，他的日記上曾寫「致英京書鋪函。」[21]「接巴黎書鋪寄到《勒賓幼童年日記》六冊，內附勒賓神父名片。」[22] 到晚年，他時常清理自己的藏書。例如，「清理《東方雜誌》。」[23]「繼續清理書架，迎老書可送者送，可留者留。」[24] 他又將不少藏書捐贈魯汶大學圖書館。

> ……到欣老（陸徵祥）書房，書桌上忽堆著許多中文法律書。欣老說：「羅神父，看這些都是法律書，我昔日買書，沒有人指點，只要是法律書，我都買，所以買的法律書很多。整套的法律書，我已經都送給魯文（汶）大學圖書館了。餘下的只是這些零碎的了。」[25]

幾年前，魯汶大學圖書館將陸徵祥捐贈的其中一部份中文書籍丟棄，卻幸運地由馮浩烈院長從圖書館走道旁的紙類回收箱內拾回，歸還聖安德魯修道院。因陸徵祥晚年清理藏書，目前展覽室留下的書籍多半是中文。除法律外，亦有傳統經典及植物學等不同主題。即使這些剩餘的書冊不是完整的收藏，也足以說明他廣泛的閱讀興趣。再

[21] 1931 年 7 月 30 日陸徵祥日記。
[22] 1934 年 6 月 29 日陸徵祥日記。
[23] 1940 年 4 月 12 日陸徵祥日記。
[24] 1940 年 4 月 23 日陸徵祥日記。
[25] 羅光，〈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三）〉，頁 83。

者，陸徵祥收藏的字畫，其中不乏出自名人之手。他曾特地「定做洋鐵筒，裝徐東海（世昌）墨跡。」[26] 而他晚年同樣不時「清理字畫及舊書等」。[27] 目前展覽室內的書法字畫恐怕也不是陸徵祥的完整收藏。令人不免可惜的是，部份卷軸因爲長期缺乏專門的保護而出現受潮的狀況。過去幾年，阮麗明女士和馮浩烈院長花費許多精力整理展覽室內的字畫，目前已有一份詳細的清單提供參考。[28]

陸徵祥留下的照片爲數不多，卻極爲罕見。從影像史學的角度看，它們可串成一個有意思的傳記故事，頗具參考價值。筆者在此舉兩張照片爲例，說明這些照片之史學價值。第一張是座宅院的大門（圖二）。筆者的判斷，此處應是位於紫禁城東邊不遠的石大人胡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晚清外務部迎賓館）。若能比對晚清、民國時期、及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照片和文字紀錄，我們或許能建構一個極爲有意義的建築史敘事。第二張相當有趣，一間富麗堂皇的西式廳室，但拍攝的時間與地點皆不詳（圖三）。從左半部的巨幅袁世凱像推測，極可能是民國初年陸徵祥擔任外交總長時的外交部一角。有關他在總長任內推動的外交改革，已有顏惠慶、曹汝霖、以及顧維鈞等人的回憶錄提供史料佐證，我們不必在此贅述。[29] 另一方面，就筆者所知，目前沒有相關史料描述當時外交部的內部裝潢。爲什麼其擺設如此奢華？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受許景澄之影響。

圖二

> 許（景澄）師曾囑咐我：「若一旦做了欽使，應把前三年的公費薪金，都用在門面的講究上。」[30]

[26] 1940 年 2 月 15 日陸徵祥日記。

[27] 1940 年 11 月 1 日陸徵祥日記。

[28] 根據阮麗明女士表示，她和馮浩烈院長此刻正在整理陸徵祥留下的金石、照片等物品。筆者相信，不久的將來，他們會完成一份包括字畫在內更完整的清冊，提供眾人參考。

[29] 顏惠慶，吳建雍等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4: An Autobiography*）（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顧維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 1 冊。

[30] 羅光，《陸徵祥傳》，頁 55。

圖三

羅光相信，「講究排場，不在爲私人爭面子，實想爲國家爭口氣。」[31] 許景澄告訴陸徵祥，「使館的陳設，十分之七，應是中國東西。」[32] 他後來擔任駐荷蘭欽使時，的確依照許景澄的教誨，以中國傳統的傢俱和擺飾佈置使館。這張照片則暗示，受陸徵祥影響頗深的北洋外交部，同樣也關乎國家門面，其擺設卻偏向西式。這可說是一個跳躍式轉變，其間的意義仍待我們挖掘。不論如何，這張照片是一份相當珍貴的素材，讓我們一睹當時外交部內之陳設。

（二）檔案

數量龐大的 52 箱檔案大多數是中文和法文，只有少量是英文。其時間跨度大，最早的可以追溯至晚清他擔任翻譯時之文件，晚近的亦有袁同禮和陸徵祥的秘書愛鐸在他死後討論立傳事宜之通信。令人覺得可惜的是，檔案的保存狀況也不甚理想。陸徵祥有封抗戰時期軍事委員會的信箋，非常可能出自宋美齡手筆，而信尾落款處竟不幸被人裁除（圖四）。此外，狄谷（Henri de Codt）是陸徵祥擔任外交總長期間延聘的比利時籍顧問。他有數十頁法文手稿原先亦收在這批檔案之中。爾後，其後人要求修道院歸還手稿，並以複印件取代之。據筆者所知，該手稿目前存放在其後人位於布魯塞爾的家中。

[31] 羅光，《陸徵祥傳》，頁 56。
[32] 羅光，《陸徵祥傳》，頁 56。

圖四

即使如此，這批檔案仍具相當之研究利用價值。截至目前爲止，似乎僅 Anne Vansteelandt 曾撰文介紹這批檔案材料；她主要關心的是有關基督教之史料，甚少提及其他中文材料。[33]陸徵祥位居要職，又親歷《二十一條要求》和巴黎和會等關鍵的外交事件。我們或許會奢望從他遺留的檔案裡挖掘某些不爲人知的政治內幕。若眞是如此，我們很可能會感到失望。如同藏書和書法字畫，陸徵祥晚年經常清理信件。他在日記中說：

> 清理舊信。凡信之有保留之價值者，實不多見，証明所留各函徒廢時間而無益也。嗣後力戒之。[34]

翻閱陸徵祥的日記，我們發現他晚年不時清理手邊的文件。留下的檔案可說是他個人認爲「有保留之價值者」。絕大多數是他在中國及歐洲的有關社會、文化、及宗教之活動紀錄，而政治外交類文件則少之又少。筆者相信，我們應更加注意這批檔案在近代中國政治史和外交史以外的利用之可能性。

作爲一名外交官，陸徵祥必須參加社交活動，接觸各國政商名流。在這 52 箱檔案之中，有不少相關的有趣材料。例如，陸徵祥留下駐俄期間的一張晚宴菜單以及一張音樂會節目單。晚宴菜單以法文寫成，頂部印有大清帝國的國徽，菜餚屬西式，包括餐前湯和餐後甜點水果等等（圖五）。音樂會節目單以中文寫成，沒有大清帝國的國徽，曲目包括俄國國歌，以及著名的西方音樂家之作品爲主（圖六）。另一方面，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指出，近代來華的外國人盡其所能地複製、移植在自己國家

[33] Anne Vansteelandt, “Lu Zhengxiang (Lou Tseng Tsiang), a Benedictine Monk of the Abbey of Sint-Andries”, in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d. Jeroom Heyndrickx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U. Leuven, 1994), pp. 223-230.

[34] 1940 年 5 月 26 日陸徵祥日記。

MENU

Dîner

du 28 Juin / 10 Juillet 1897, St. Pétersbourg.

Hors-d'œuvres

Potages: Tortue / St. Germain

Petits pâtés

Sterlet Dœinshoë à la Russe

Noisettes de Veau, Périgord

Chaufroix d'Ortolans, Cumberland

Punsch Victoria

Rôtis: Jeunes Poulardes et Bécasses

Salade Romaine

Asperges, sauce Hollandaise / Polonaise

Plombière Nesselrode

Tartelettes aux Framboises

Fruits.

圖五

圖六

原本的文化活動與物質生活，例如咖啡、葡萄酒、下午茶、酒吧、和夜總會等等。[35] 相比之下，十九世紀末駐俄的中國外交官保持相當程度的文化開放性，採取彈性策略，或舉辦，或參與不同的西式文化活動，與各國政商名流應酬。這不啻是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外交轉型的一個可能的文化史新視角。

另一方面，陸徵祥有虔誠的信仰；他的願望是讓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天主教，親近上帝。Ernest P. Young 已經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陸徵祥試圖幫助中國與梵蒂岡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法國以天主教徒的保護者自居，主張中國必須透過法國接觸梵蒂岡，因而反對中梵建交。[36] 當時法國政府聲明反對的文件是陸徵祥少數保留下來的政治外交類檔案，顯見此事對他的意義之重大。不過，挫折沒有打消他拓展天主教在中國的信仰基礎之努力，他持續與國民政府內部的個別教徒（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保持聯繫。根據前述的軍事委員會信箋，在抗戰初期，他寄一本比利時國王亞爾倍（King Albert）的傳記給在漢口的蔣介石。亞爾倍國王是位虔誠的教徒；在第

[35] 費維愷，〈外國在華勢力〉，載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2007 重印），上卷，頁 131-136。

[36] Ernest P. Young, *Ecclesiastical Colony: China's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French Religious Protector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91.

一次大戰期間，他領導比利時國民，勇敢抵抗德國的入侵。陸徵祥藉亞爾倍的故事鼓勵蔣介石，希望他抱持（對上帝的）信仰，領導中國人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國共內戰方酣之時，曾擔任陸徵祥副手的顏惠慶，從上海寫信，感謝並告知陸徵祥被任命根特（市）聖彼得修道院院長（Abbot of St. Peter's of Ghent）的晉升典禮紀念冊已寄到，同時盼望陸徵祥能返國從事「道德與精神重建」之工作。[37] 另一位北洋時期的下屬，後來在國民政府外交部任職的刁作謙，寄信給陸徵祥，告知也從顏惠慶那邊取得晉升典禮紀念冊，詢問其是否可能返國，「引導你的同胞接近上帝」。[38] 陸徵祥最後沒能返回中國，他在布魯日終老。另一方面，他和蔣介石、顏惠慶、刁作謙等人擁有共通的信仰。即使遠在千里之外的比利時，陸徵祥仍然十分關心中國人的信仰發展，也沒有忘記與國內的教友維持友誼。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相當重視與國民政府內部有信仰的官員之間的交流。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從上而下之宣教策略。陸徵祥的作法似乎對民國時期中梵關係的進展有隱而不現的微妙作用。這是我們討論中梵關係史或近代中國的基督教史應當特別注意的地方。

三、結語

長久以來，我們依賴羅光和石建國的傳記，理解陸徵祥的生平。然而，這兩本傳記仍留下不少空白，需要後續的討論與挖掘。《回憶與隨想》的翻譯以及史料的數位化讓研究應用變得更爲容易。當資料庫開放使用之後，將有助於我們透過陸徵祥本人，理解更宏觀的歷史問題，例如近代中國與梵蒂岡的關係等等。隨著巴黎和會一百週年紀念即將到來，陸徵祥可能再度成爲世人關注與討論之焦點。我們可以預期有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回憶錄和史料之利用，提出新的觀點，挑戰我們既有的認知。這一點，值得我們期待。

[37] 1947 年 6 月 10 日顏惠慶（W. W. Yen）致信陸徵祥（英文）。此頭銜是榮譽職，陸徵祥沒有赴任。羅光，《陸徵祥傳》，頁 235。

[38] 1947 年 8 月 4 日刁作謙（P. K. C. Tyau）致信陸徵祥（英文）。